

■ 红色记忆·不忘初心

他生于殷富之家，却有一颗悲天悯人之心，为社会变革、百姓福祉而矢志奔走；抗日战争全面爆发，

他宣传抗日救亡、组织抵抗运动，将满腔热血浇灌在了故土之上。

袁复荣：甘洒热血浇灌抗日之花

□ 本报记者 鲍青
本报通讯员 郭奎奎

盛夏时分，热气蒸腾，酷暑难耐。曹县城南10公里的野外，凉风习习，“太行堤”的余迹默默挺立着。它始修于明孝宗弘治年间，曾蜿蜒绵亘、屹然如山，“南挡洪水，北拦风沙”，庇护着鲁西南一带的无数生灵。

75年前，一支装备落后、补给匮乏的抗日武装来到了太行堤旁。他们在军分区司令员朱程、专署专员袁复荣的带领下，以太行堤为天然工事，和数倍于己的日伪军殊死搏斗。他们在打退敌人一次次进攻后，终因寡不敌众而突围失败。袁复荣也将满腔热血洒在了毕生热爱、矢志奔走的故乡大地上。

光阴侵蚀消磨，太行堤凋零残破。但茂盛葱茏的草木，低徊呜咽的夏风，似乎仍在诉说那段可歌可泣的悲壮岁月。

生于殷富，心念疾苦

“袁复荣的一生，宛如划破夜空的流星，虽然短暂却极璀璨。”曹县党史办主任王明锐说。上世纪八十年代，袁复荣牺牲40年之际，曹县党史工作者曾寻找他的亲属战友，从零星回忆中勾勒复原他的音容形象。

袁复荣出生在富甲一方的大户人家。“郑庄街道袁石庄的袁家是清末有名的富户乡绅。家族田产众多、分布广泛，还拥有一些手工作坊。袁氏的姻亲也大多是附近的大家族。”王明锐说。

1909年，起义民变四起，末世氛围日渐沉重。袁复荣的降生给久历动荡的袁家平添了一丝喜悦。

清末民生凋敝，百姓普遍贫困，鲁西南的乡村多灾多难，生活更是艰难。但袁家殷富，袁复荣有条件享受优越的物质生活、接受良好的教育。但他似乎生来就与一般富家子弟不同，对贫苦百姓有极大的同情。旧时代的长工、佣人地位低下，备受歧视，袁复荣却总是悲悯其境遇，从不另眼相待。

少年的袁复荣，用好奇的目光打量着这个混沌的世界：身居高位者声色犬马、恣意享乐，饥寒交迫者垂死挣扎、麻木不仁。两极分化的社会现实给了他深刻的印象和强烈的刺激。

社会缘何如此，矛盾如何解决？年少的袁复荣百思不得其解，陷入深深的迷茫。

殷实的家境、开明的氛围，为袁复荣接受教育、寻求救民真理提供了条件。他的兄长袁春霆（又名袁振来）曾在河南读书，接受过先进思想的洗礼。袁春霆后来追随国民党左派邓演达，成为“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”（中国农工民主党的前身）山东地区负责人之一。妹妹袁兰荣也曾在河南静宜中学读书，后来又回到山东省立女子师范求学。

袁复荣和兄妹一样，先在乡村读完小学，后陆续来到河南洛阳、山东济南求学。外部的世界，丰富了他的视野。新颖的思想，拓展了他的认识。在济南读书期间，袁复荣通过老师和同学开始接触共产主义思想，自觉灵魂经受了一番脱胎换骨，心中的疑虑渐渐找到了方向。他的表妹陈赞凯后来回忆说：“起初每次二哥（袁复荣）来找我，总是风尘仆仆，神情疲惫不堪。后来他变得精神焕发，一讲起现实的黑暗、革命的理想，都是慷慨激昂，滔滔不绝。”陈赞凯眼中袁复荣精神的先后差异，正是他接触共产主义前后的思想变化。

一个周末的清晨，天空飘着毛毛雨。陈赞凯和袁复荣相约到济南郊外田野散步。天空乌云密布，农人冒雨劳作，袁复荣似乎又勾起童年的记忆，他心情苦涩复杂：“社会黑暗腐败，群众饱受苦难，我们要敢于斗争，不能被困难吓倒。”

随着接触共产主义越久，袁复荣就对未来越有憧憬。1930年，袁复荣加入中国共产主义共青团，次年又加入中国共产党。随即，他还介绍陈赞凯加入了共青团。

袁复荣身材魁梧，脸盘方正，双眼炯炯有神，性格忠厚善良，很快赢得了大家的信任和尊重。在学校里，他和同学创办刊物《摩托团》，尽力传播进步思想，鼓励青年学生不能

只埋首书斋，而要放眼现实、关心时事。

正当袁复荣大声疾呼之际，济南上空的政治局势日趋紧张。1931年，山东省政府主席韩复榘为了加强个人统治，开始大肆搜捕进步师生，袁复荣和《摩托团》也位列搜捕名单。

搜捕行动开始后，袁复荣因事先得知消息方才化险为夷。他趁夜返回故乡曹县，来到家乡的仲堤圈村高小教书育人。三个月后，他见形势有所缓和，又秘密赶赴滕州和泰安，继续从事革命行动。

这年初秋，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，在国民政府不抵抗政策下，东北全境迅速沦陷，国内抗日浪潮高涨。

此时，袁复荣化名“袁钊”秘密返回济南，积极投入抗日救亡运动。他组织学生罢课游行，呼吁国民政府出兵抗战。他还克服种种困难，组织起济南市大、中学生赴南京请愿团。

请愿团返回济南后，袁复荣又组织学生成立济南读书会。每次的读书会活动，都是一次抗日救亡的愤怒呐喊。在袁复荣推动下，读书会不断扩大，济南许多学校相继建起了分会。

身陷囹圄，九死一生

济南读书会日益壮大，引起了韩复榘等人的警惕。他们开始密谋布置抓捕，要把这些主张抗日的团体悉数扼杀。

为了吸取上次走漏风声的教训，此次抓捕行动特意选择夜间进行。1932年3月20日夜，韩复榘出动大批军警，大肆搜捕济南各学校，抓捕进步师生员工70余人。66岁的著名教育家范明枢和进步教师陈济源也不幸被捕。其中，袁复荣、袁春霆、袁兰荣等袁氏五人都被捕入狱。

由于被捕人数众多，且不少是教育界知名人士，引起社会舆论强烈反应。

当时的报纸介绍道：“济南连日大捕共党，前后破获三十余处机关，逮捕正犯及嫌疑犯六十人。”为了掩人耳目，逮捕行动在夜晚十时开始。反动军警在小王府鹤华桥、第一乡村师范、正谊中学、女子师范、女子中学，共抓捕学生教师四十余人。接下来两天，他们又逮捕三十多名学生。反动军警经过初步调查，认定“男性中之民众教育馆职员袁春霆，女性中之女师学生袁兰荣，关系较为重要。两袁为兄妹，并闻尚搜获大批重要文件”。70余名被捕的“嫌疑犯”，韩复榘拟加以甄别，再送军法会审委员会审问。

不知是韩复榘有意诬陷还是调查出现谬误，“首犯”袁春霆其实是国民党左派代表，并非共产党员。他在济南参与“第三党”（即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）行动，意图团结支持抗战人士，反对不抵抗政策。但在风声鹤唳的当时，“第三党”领袖邓演达已遇害，稍微同情共产党的，往往都会被冠以共产党员的罪名。

抓捕行动引起了国内许多人的关注，一些进步人士开始组织营救行动。“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”令成员冯峻五协调各方救援。冯峻五先给韩复榘发去电报，呼吁立即释放众人，但遭其推诿搪塞。冯峻五随即又致函宋庆龄、蔡元培领导的国民保障同盟盟出面斡旋，他在信中说：“故友袁春霆、袁复荣……三十余人……于去年三四月间，在山东被捕，迭遭酷刑拷讯，至今尚羁押于军法会审委员会。”

宋、蔡获函后，中国民保障同盟总会立即召开会议，很快通过了冯峻五的信函请求：“山东



王厂战斗遗址

旅平同乡冯峻五等函请营救……在济南被拘禁之袁春霆等三十余人。议决：函请山东省政府从实办理，斟酌开释。”

两天后，宋庆龄、蔡元培联名致电韩复榘，要求“务请即予释放，或交法院公开审判，以重人权，而张公道”。两人的信函给了韩复榘很大的压力，他一边释放大多数“无辜”的嫌疑犯，一边对“首犯”秘密审讯，尽快“生米煮成熟饭”，制造不可逆转的结果——判处死刑。

千钧一发之际，在山东赋闲隐居的冯玉祥，发挥了重要作用。

韩复榘曾在冯玉祥队伍中任过团长、旅长、军长等职，是冯玉祥颇为器重的老部下。在国民党新军阀发动的中原大战中，韩复榘为利所诱脱离了冯玉祥。但此后他依旧对冯玉祥敬重有加。

袁复荣人微言轻，本与冯玉祥并无任何往来。但当时和袁复荣一起被捕的，还有著名教育家范明枢。他们一道在狱中戴铐受刑，惨遭折磨。袁复荣虽然年轻，但性情坚毅，心态豁达，给范氏很深的印象，成为患难与共的“忘年交”。有人对范明枢说：“范先生这么年纪也来受这样的苦，我觉得非常痛心！”范明枢却答道：“你别这样说，我能同这些青年们一起过一过这种生活，这是我的光荣！”他的话使包括袁复荣在内的青年备受感动。

范氏被捕后，其家人多方组织营救，却始终无法叩开高墙铁门。最后在泰安县长周百钺引领下，家人火速赶往泰安普照寺拜谒冯玉祥。冯、范二人也不相识，但冯玉祥一听他是社会贤达、仁人志士，当即给韩复榘修书一封，称：“你治下的山东省，66岁的老人，当共产党治罪，那还了得，快快放出来。”

韩复榘接信后，先是伪称被捕人员名单中没有范明枢，企图继续敷衍塞责，掩人耳目。冯玉祥听后大为恼火，称自己已悉数知晓，要韩复榘莫再狡辩，立即放人。

韩复榘最终还是不敢违背老长官的意愿，不得不违心释放了范明枢。范明枢出狱后，心里记挂着狱中一起受苦的难友。他立即赶赴泰山，借着向冯玉祥致谢的机会，讲述袁复荣等其他狱友的受难情况。冯玉祥立即派人将七人名单送交韩复榘，并写下“爱国无罪，刀下留人”八字。韩复榘经再三权衡，最终将七人由死刑改为“暂缓执行”，后又改为五年有期徒刑，并提前一年“取保释放”。

袁复荣就这样在鬼门关走了一遭。狱中生活虽然艰难，但他抓住一切机会坚持学习，思想境界并未有丝毫滑坡。

1936年3月，袁复荣顺利出狱。此时济南已经无法支持他继续开展革命工作，他再度回到故乡。

立足故乡，抗日救亡

被捕之初，袁复荣斗志昂扬，深信真理必胜；得知死刑判决，他视死如归，始终未因畏惧而吐露党的秘密。后来幸免于死，袁复荣更觉“生命可贵，应献身崇高事业”。

因山东党团组织遭到严重破坏，袁复荣一时和党失去了联系。他只能回到曹县，在家乡继续从事革命活动。他先经人介绍，以在县城西关小学教书作掩护，继续参与抗日救亡行动。

教书期间，袁复荣以走亲访友形式，组建了“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”，发展了不少成员。

1937年8月，共产党员王健民、沈建华来到曹县。袁复荣很快找到他们，恢复了自己的党员身份。

两个月后，日军沿京沪铁路长驱直入，山东形势岌岌可危。此时，中共曹县工委成立，袁复荣担任宣传部长。不久，中共曹县县委成立，袁复荣担任书记。

为了发展抗日力量，袁复荣来到曹县西北韩集、刘岗、郭小湖、安陵集一带，建立农村基层支部，大力发展农村党员，发动、组织农民群众。

袁复荣平易近人，既没有“地方官员”的架子，也没有“知识分子”的清高。他走到哪里，就和群众一块吃住在哪里，很快和群众打成一片。因袁复荣在家排行老二，大家都亲切地称他为“袁二哥”。大家有话喜欢和他谈，有什么诉求也愿意同他讲。袁复荣还在有条件的村庄开办抗日青年训练班和农村夜校，大力宣传抗日救国，使群众思想觉悟得到了很大提高。

1938年10月，曹县县城沦陷。原来在城里工作的党员陆续撤到了曹县西北的农村。

1939年1月中旬，八路军第一一五师第三四四旅代旅长杨得志和政治部主任崔田民，率领两个主力团来到曹县西北地区。

抗日根据地的发展引起了国民党曹县党部的注意。1939年暮春，国民党曹县党部的王石村找到袁复荣，以封官许愿诱惑他“改旗易帜”，接受他们的领导。袁复荣严肃指出：“你们自己不积极抗日，怎么能不让群众起来抗日？”王石村在曹县西北活动了一天一夜，却是颗粒无收。

不久，曹县东南也建起抗日根据地。为了巩固新开辟的抗日根据地，袁复荣连续多次召开全县文化教育界和地方知名人士参加的座谈会，大力宣传《抗日救国十大纲领》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，积极动员他们参加抗日。

除了争取知识分子的支持，袁复荣还通过地方党组织和各地青年救国会，在曹县第四高级小学主持召开青年训练班，组织招收全县近百名抗日青年知识分子参加训练。袁复荣亲自授课，细致耐心地帮助大家学习，对重要问题反复讲解，直到大家弄清学懂为止。经过学习，学员们的思想觉悟有了较大提高，大多数学员被吸收到党的队伍中来，为做好群众工作增添了一批新的骨干力量。袁复荣还积极组织青年参加八路军，帮助杨得志部由原来的两个游击大队发展到五个主力团，兵力超过1万人。

在袁复荣积极努力下，曹西北革命老区日臻巩固，曹东南新区呈现生机勃勃的景象，抗日群众运动蓬勃开展起来。

1939年7月1日，中共鲁西南地委在刘岗建立，袁复荣任地委委员兼宣传部长。这年下半年，日本集结兵力对根据地实行“扫荡”。袁复荣带领群众，取得了反“扫荡”斗争胜利，鲁西南抗日根据地日趋巩固。

1941年夏，鲁西南军分区和抗日专员公署先后成立。1942年5月，袁复荣担任专署专员。他在统一战线工作、开展武装斗争、减租减息和根据地建设等方面倾尽全力，工作很有成效。

殊死搏斗，喋血故土

1943年夏天，曹县东南一带大片日伪军“准治安区”成为根据地的一部分。正当鲁西南抗日形势一片大好之际，日寇发动了规模空前的扫荡，意欲彻底清除自己的眼中钉。

当年9月中旬，日军在济宁、徐州、商丘等地集结兵力万余人，分十路对鲁西南根据地进行“铁壁合围”式的大“扫荡”。深夜，日军自单县出发，直奔曹县，企图一举将鲁西南根据地踏平。

鲁西南地委、专署、军分区得到大“扫荡”情报后，研究了应变措施，决定将全区抗日武装分为三个梯队。其中军分区司令员朱程、专署专员袁复荣率“民军”第一团、第二十一团、骑兵团、专署机关一部为第一梯队，携电台一部，活动于鲁西南根据地东南部。

袁复荣要求各部队在活动地区封锁消息、隐蔽驻地，并发动群众进行秋收秋藏，空空清野。

23日，袁复荣率部驻扎到曹县西南王厂村。王厂村位于黄河故道北岸，西、南两面均



袁复荣烈士像

有太行堤为依托，地势险要，进可攻退可守。

28日早7时，袁复荣率部在王厂村西北约4公里太行堤下集结，准备秘密转移，打乱敌人的“扫荡”目标。

这时，八路军集结地的正东偏北方向，出现快速行动的日军骑兵。他们发现八路军踪迹后，立即发挥机动优势，迅速向左侧迂回包抄。朱程和袁复荣立即下达命令，要求部队向西北方朝根据地边缘区靠近，避开敌人的合击，尔后再穿插到敌占区活动，以牵制敌人“扫荡”。

但转移行动刚开始，日军骑兵已快速迂回到部队集结地左后侧，挡住了部队去西北的道路。而在东、南、北三个方向，又发现了敌人的踪影。一场恶战即将爆发。

袁复荣果断指挥部队开始突围。在指挥和掩护作战部队突围中，袁复荣等干部和指战员一百余人，陷入日军重重包围中。他命令队伍抢占王厂村，以便坚守，然后伺机突围。但敌人快速部队行动迅速，已经提前占领此处，并在民房门楼制高点，以机枪火力封锁进村通道。朱程随即向王厂西南郑庄村撤退，又遇敌火力阻击。危急时刻，朱程、袁复荣令部队抢占郑庄村西南土墙围子。

据王厂村民张新轩讲述，当年这个土墙围子长30余米、宽20余米，有一人多高。院内有停放牛车的棚子和一座敞门灰房，堆放一些杂物和柴草。土墙外有一条水沟，北侧50余米处有一个浅水塘。土围子周围地形开阔，便于坚守。

进占土围子后，朱程、袁复荣给非战斗人员也发了枪。据当年幸存者回忆，朱、袁向战士们作了非常简短的战斗部署，并带领大家庄严宣誓：“誓死坚守阵地到黄昏，誓死不当俘虏，为抗日流下最后一滴血！”

全体指战员随即用刺刀挖掘了简易工事，并在土墙上掏了枪眼，作好了决战准备。

一个半小时后，大股日军将阵地周围村庄和太行堤占领，对八路军重重包围。进占郑庄的敌人，在轻重机枪掩护下，向八路军北面和东南面发起进攻。

敌人的火力凶猛，冲杀疯狂，步步向土墙逼进。八路军顽强坚守阵地，多次打退了敌人的进攻。

中午12时，两枚毒瓦斯弹在土墙附近爆炸。趁着八路军呼吸困难之际，敌人又发动了第四次冲锋。经过激烈搏斗，八路军再次击退了这股进攻。

下午，日军暂时停止了射击和进攻，战场上一片诡异的寂静。但这种寂静，只是决战来临前的片刻宁静。大家知道，这残酷的沉寂，是日军在调拨兵力、配置武器，残酷的战斗即将开始。

傍晚时分，随着日军一连串炮声的轰炸，敌人的总攻开始了。在优势武器掩护下，敌人从四面八方朝着土墙冲来。不久，南面的土墙被炮火击塌，院内战士伤亡惨重。最后，战士们弹打尽，敌人冲进院内。朱、袁立刻命人砸毁电台、摔坏机枪，和敌人扭打在一起。夕阳残照，晚霞如血，包括朱程、袁复荣在内的百余名抗战将士，喋血太行堤故土。

战斗进行时，一个日军战地记者记述了王厂战斗的惨烈，“（八路）决死指挥”“必死抵抗”“不见降服的样子”。当日军进入阵地，此时阵地已“有如地狱”。

当逃难的村民返回故乡，发现村庄内遍布八路军战士的遗体。随后几天内，郑庄村民在村后洼地刨了两个坑，将战士遗体抬入坑内安葬。

1945年9月，抗战胜利结束。冀鲁豫行署取“复”“程”二字，在曹东南青堆集设立复程县，以纪念朱程和袁复荣。

二人思想冥冥中有契合。所以，冯玉祥读书刚告一段落，就与范明枢商议办学之事。他们深感教育关乎国家兴亡，应大力提倡。冯玉祥与范明枢一起创办“泰山武训学校”，上设总校，下辖小学15处。冯任董事长，范任总校长。学校办学指导思想明确，既学习抗日道理又学科学知识。冯玉祥还和范明枢编印教材《哲学问答》，向学生进行爱国、爱民、抗日、努力学习教育。

针对农民贫穷、需要劳动谋生的情况，学校实行半工半读。按农事季节放农忙假，对贫困学生予以特殊照顾，让他们能安心读书。为扩大经费来源和培养学员实践能力，学校还建立了木、石、铁、编织等小工厂，并建有“科学馆”、实验园林等。

1935年1月，冯玉祥应蒋介石之邀赴南京参政议政。二人依依惜别之际，冯玉祥决定“武训小学之事”由范明枢“全权处理之”。冯玉祥到南京就任副总委员长后，邀请范明枢率武训小学教师和学生代表赴南京参观。参观途中，他给以热情接待。临别之际，他还不忘赠送钱物，改善小学经济状况。

虽然离开了泰安，但冯玉祥一直关心武训小学。他帮助学校引进果树，解决经费、工程建设等问题。范明枢还多次写信给冯玉祥，有时亲往南京向他讲述学校办学情况。

·相关链接·

一起冤狱营救，令冯范二人成为莫逆之交。而内心忧国忧民、牵挂教育的契合，更让他们友情弥笃，愈显真挚。

冯范之交：起于冤狱，深于忧民

□ 本报记者 鲍青

袁复荣身陷韩复榘罗织的大狱，最终由死刑判决改为有期徒刑，得益于冯玉祥的出面营救。而通过此次营救行动，冯玉祥和范明枢结下了深厚的友谊。

在国民党新军阀争斗中，冯玉祥居于下风。1932年春，他自感有志难伸，意兴阑珊来到泰安，隐居在普照寺中，决定观望时事，“看时局变化如何再报国”。

当年4月，冯玉祥的部下自济南而来，向他报告济南大范围捕捉共产党之事。5月，泰安县长周百钺来到普照寺拜谒，向冯玉祥详细陈述了范明枢被以“共党嫌疑”抓捕的经过，请其代为营救。

范明枢早在五四运动时，曾为带领省立一师学生开展反帝斗争，头撞军警刺刀，逼迫围校军

警退缩。九一八事变后，他因宣传抗战而身陷囹圄。范明枢的事迹令冯玉祥大为感慨，立即致电韩复榘要求放人。当范明枢出狱，两人相见时，冯玉祥诙谐地说：“你因为宣传抗日坐了监，我因为抗日下了野，咱们是同命相怜嘛！”二人结下了初步友谊。范明枢随即请求营救关押的其他青年，袁复荣得以保全性命。

当年10月，冯玉祥北上组织抗日力量，却遭政敌构陷而失败。1933年，他一怒之下再度隐居泰山。

此时，得知冯玉祥再度来泰安的消息，范明枢特意前往问候。范明枢赞扬冯玉祥组织抗日同盟军：顺国民之意，合国民之心。冯玉祥深感范明枢是难逢知己。

冯玉祥想不再过问政事，便提出请范明枢教授自己古文。起初，范明枢因顾忌冯玉祥身份而

谦称不敢。冯玉祥却表示愿意和范明枢约法三章：“一不逃学，二不胡闹，三守规矩。”范明枢见他诚恳谦逊，便欣然收下了这位“学生”。

8月24日起，范明枢开始为冯玉祥讲授《左传》。每天下午6时开讲，讲完《左传》，又讲《春秋》。冯玉祥虚心好学，非常用功，不懂就问。范明枢见他好学不倦，无论天气好坏，也不耽误上课。

冯玉祥除自己学习古文，还让警卫营也跟着学。他还活学活用，经常与范明枢共同探讨学术问题。上课之余，两人分析抗战时局，认为“南京的人们是始终不抵抗，并且杀害要抵抗的人们”。冯玉祥还赠给范明枢一枚铜制中国地图版，上书“还我河山”四字。

通过跟随范明枢学习，冯玉祥更觉教育的